

罪涌与恶壁：一个共生发生的考察

犯罪与邪恶不是两个独立实体的事后互贴标签，而是同一座堤岸在同一个事件中双侧溃决的共生后果

高鹏 著 · SDE 学员 · 刑法理论与道德心理 · 2026年7月26日

摘要 “邪恶才犯罪，还是犯罪才邪恶”——这一追问在法律、神学与道德心理学中反复现身，其常规形态是一场关于先后次序的拔河。本文放弃这道选择题所依赖的预设，转而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侵害事件如何被生成为“犯罪”？一种排斥反应如何被生成为“邪恶”？二者是否共享同一个更深的发生源？本文的判断是：犯罪与邪恶并非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事后互贴标签，而是同一座堤岸在同一个事件中双侧溃决的共生后果。在个体一侧，一种从未在关系中成功绽出过容纳界面的原初失措，在长年累月的无处可去中被逼成一种向外溃决的侵害行为——本文称之为罪涌。在社群一侧，侵害行为撕破了“人类行为是可理解的”这一认知基底，恐惧瞬间凝固为将侵害者从“人”的范畴中整体切割出去的排斥面孔——本文称之为恶壁。罪涌与恶壁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它们在同一个事件中一并发生、互为对方的燃料，在此后的每一次遭遇中重复加固，形成一座不引人注目却持续焚烧一切折返余地的冷焰循环。本文将这一判断置于精神分析的发生传统、刑罚理论、道德心理学、犯罪学与累积性劣势理论的既有讨论中加以对照，以比昂的容纳-遐想模型为最近站外近邻进行正面区分，以一个真实案例展示从容纳界面从未绽出到罪涌溃决、再到恶壁砌成与再犯的完整发生链，并以跨历史、跨制度的推衍展示这个共生结构的普遍性，最后直面天生犯罪人论、真正邪恶存在论和累积性劣势替代解释等反驳，给出证伪条件与边界。

关键词：罪涌；恶壁；共生发生；容纳界面；认知基底断裂；冷焰循环

一、引言：一个在历史中反复现身的追问

“邪恶才犯罪，还是犯罪才邪恶”——这个追问几乎与法律本身同样古老。它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发明出来的思想实验，而是每一次极端侵害事件发生之后，从法庭辩论到街头闲谈、从神学论争到新闻报道中都会自动触发的一道裂痕：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一个本来就有害的人，还是一个因为犯了罪才被我们叫作恶的人？

在漫长的前现代法律传统中，这道追问的答案似乎不容置疑。从《汉谟拉比法典》对褻渎者的惩罚，到中世纪教会法对异端的审判，法律的背后始终站着一个预设：某些内在的灵魂状态——堕落、受魔驱使、意志的败坏——是恶行的真正源头。法律不过是在外在世界中将这些已然邪恶的主体捕获并处置。直至今日，当一个社会面对极端残暴的罪行时，人们的第一个冲动仍然是向内挖掘：他小时候是否已经显现端倪？他是否毫无共情能力？他的内心是否早已是“恶魔”的容器？在这个回答里，邪恶先于犯罪——一个人内心的败坏是原因，侵害行为只是这个原因的外在表现。

启蒙运动以降，另一种回答逐渐获得了制度性的力量。自贝卡里亚以来，现代刑法把注意力从行为人的灵魂转向外在行为。罪刑法定、责任主义、比例原则——这些基石都在说同一件事：法律惩罚的是行为，不是人格。在这一逻辑下，“邪恶”只是一个事后的道德评语：一个人先犯了罪，然后社会把这桩罪行当作证据，推断出他有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心。在这个回答里，犯罪先于邪恶——侵害行为是事实，道德标签只是社会对这个事实的追加。

这两套回答看似对立，却共享着同一个未经追问的预设：“邪恶”与“犯罪”是两个各有其稳固边界、可以相互分离的现成实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在时间轴上编排先后次序。仿佛世界上预先摆好了一个叫作“犯罪”的盒子，也预先放好了一个叫作“邪恶”的标签，剩下的任务只是判断哪个先贴上哪个。

这个预设本身，既是那个追问在历史上得以被反复提出的条件，也是它在触及某些极端个案时开始崩塌的边界。它之所以能在漫长历史中持续有效，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日常犯罪中，行为与行为人的道德形象之间的裂痕足够小、社会对“什么是可理解的人类行为”的默认预设足够稳定，以至于我们确实可以把“他做了坏事”和“他是一个坏人”当作两个虽有先后、但各自边界清晰的事件来处理。但这条边界之所以在极端侵害事件面前崩塌，恰恰是因为那些事件所携带的过量伤害——那种让所有人都感到“完全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的质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回头质问：我们原以为彼此独立的那两个实体（犯罪与邪恶），在它们发生的那个瞬间，是不是根本就是同一件事的两副面孔？

本文试图从这个崩塌处进入。本文不是要给出“邪恶先于犯罪”或“犯罪先于邪恶”的第三个答案，而是要追问：那个被我们叫作“犯罪”的行为，是从什么样的痛苦地层里涌出来的？那个被我们叫作“邪恶”的面孔，是从什么样的恐惧里凝固出来的？二者之间，有没有可能不是两个东西相互贴标签，而是同一个“堤岸溃决”事件在两个方向上同时绽出的两副面孔？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犯罪与邪恶，不是两个相互贴标签的现成实体，而是同一个“堤岸溃决”事件在两个方向上同时绽出的共生后果。在个体一侧，一种从未在关系中成功绽出过容纳界面的原初失措，在长年累月的无处可去中，被逼成一种向外溃决的侵害行为——本

文称之为“罪涌”。在社群一侧，侵害行为所激起的认知基底断裂，瞬间凝固为一张将侵害者从“人”的范畴中切割出去的排斥面孔——本文称之为“恶壁”。罪涌与恶壁不是在时间中先后发生的两个独立步骤，而是在同一个事件中一并涌出、一并凝固，并在事后的每一次遭遇中互相提供燃料——痛苦继续涌，墙壁继续砌，直至侵害者与社会之间再无任何可供折返的缝隙。

这既不是一个法教义学内部的命题，也不是一个纯思辨的道德哲学命题。它是一场追问，追问的对象不是“犯罪是什么”或“邪恶是什么”，而是那座本该由容纳关系共同加固、却从一开始就未曾垒实的堤岸——它在内侧塌成了罪涌，在外侧硬成了恶壁。

接下来的篇幅将依次展开这一判断。第二部分通过对五组既有解释的检讨，揭示它们各自走到了哪里、共同站在了哪一块地基上——以及那块地基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了断裂。在此过程中，本节辟专节正面处理精神分析的发生传统，尤其是比昂的工作，以完成“罪涌”与最近站外近邻的不可还原性论证。第三部分追溯容纳界面从未绽出到罪涌溃决的全过程，并以一个真实案例展示这条发生链的血肉。第四部分解剖恶壁的凝固机制，并与“污名”概念划清可操作的界线。第五部分论证罪涌与恶壁的共生循环，引入实证研究的支撑，并在此处正面回应累积性劣势理论的替代解释。第六部分以跨历史、跨制度的推衍展示这个冷焰结构的普遍性。第七部分直面三组最有力的反驳。第八部分给出以辨别维度收口的结论，并阐明其伦理与制度意涵。

二、既有解释走到了哪里：它们共同站在哪一块地基上

在一个新判断被提出之前，需要对那些已经在这个议题上深耕过的既有解释做一次公平的检视。这不是一个“列举前人不足”的仪式性动作，而是要让每一组解释充分展示它看到了什么、在什么位置停下了脚步——以及，为什么它们各自停下的位置，合在一起，恰恰标出了一块此前未被追问过的空地。

本节将依次检讨五组既有解释，然后指出它们共享的那块地基——以及本文将在哪里凿开它。

第一种路径：本质主义的道德心理学。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从康德到当代道德心理学中的“黑暗人格”研究，这一脉始终将邪恶定位为一种先在的灵魂或人格状态。一个人犯罪，是因为他的欲望、恶意或冷酷压过了理性与善的呼唤。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偷梨事件的分析是这一路径的典范：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对偷窃本身的喜爱”——恶行被理解为内心已然存在的邪恶的自然流露。

这一路径的诚实之处在于，它不回避一个事实：某些侵害行为确实携带着令常人无法理解的、似乎是“为了伤害而伤害”的成分。它看到了侵害行为与普通越轨之间的质地差异，拒绝将这种差异消解为“只是社会标签不同”。但它把这个差异追踪到“邪恶倾向”这个起点时，停下了——它不再追问：那个被我们叫作“邪恶倾向”的东西，是在什么样的生命史中被逼出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在他的内在体验里，伤害别人的痛苦不仅不构成抑制，反而成为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本身，是不是恰恰证明了某种更深的情感功能的缺失——一种本应在早年关系中通过容纳互动被建立起来、却从未被建立起来的情感辨认与调节能力？

“邪恶倾向”这个解释，在最根本处，是把一个需要被追问的发生过程，封进了一个不待追问的名词里。这不是解释，这是用命名来终止追问。

第二种路径：现代刑法学的行为主义。自贝卡里亚以来，刑法把注意力从行为人的灵魂转向外在行为。罪刑法定、责任主义、比例原则——这些基石都在说同一件事：法律惩罚的是行为，不是人格。在这一逻辑下，“邪恶”是一个法律不该问、也问不了的词。这条路径划定了一道必要的制度边界：它让国家刑罚权力不至于以“邪恶”为名肆意扩张，把每一个不合群的人都变成潜在的罪犯。

但它走到这里之后，也停住了——它假装“邪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作不存在。在实然的社会世界里，一个被定罪的罪犯——尤其是犯下特定类型侵害的人——所承受的远不只是法庭判处的刑期。他承受的是一种弥漫性的、终身性的道德污名：这种污名不在任何一部法典里，却比任何一条法条都更深刻地碾碎了他出狱后的生存空间。刑法学可以说“法律不问人心”，但这句声明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法律也许不问，但社会一直在问，而且用它的答案持续惩罚着那些法律已经惩处过的人。刑法学划定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却没能处理——甚至没能看见——那道在法律边界之外、由社会自己砌起来的排斥之壁。

第三种路径：社会学标签理论。自贝克尔和莱默特以来，这一脉络有力论证了：越轨不是行为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通过建立规则、对违反规则者贴上“越轨者”标签而创造出来的。犯罪不是一个自然身份，而是一个人在社会互动中被成功贴上“罪犯”标签之后才获得的身份。莱默特进一步区分了“初级越轨”（每个人都有过的、未被标签的越轨行为）与“次级越轨”（因被标签后被社会排斥、被推入越轨亚文化而反复产生的越轨行为）。

标签理论向本文的判断迈出了关键一步——它看到了“犯罪”是社会网络生成的产物，而非个体内在本质的外显。它走到了“社会反应主动参与制造了它所惩罚的犯罪”这一步。但它有两个更深没有走下去。其一，标签理论默认被标定为“初级越轨”的那个初始行为本身，是一个不需要追问其发生条件的给定事实。一个人做了某件事，然后社会贴了标签。但那个某件事——那个后来被标签为“越轨”的行为——最初是怎么从一个人身上涌出来的？它有没有一条在标签贴上之前就已经在痛苦中推进了多年的生成史？标签理论没有追问这个，因为它的分析单位是“标签”及其效应，不是“被标签的行为”的发生条件。其二，标签理论把“贴标签”当作一个社会对个体的单向动作，却没有追问社会为什么要贴这个标签。是什么恐惧、什么认知断裂，逼着社群必须把侵害者从“人”的范畴里切出去？标签理论

的“标签”是一个描述性的社会学变量——它问的是“贴标签产生了什么效应”；本文的“恶壁”是一个生成机制——它问的是“这种排斥反应本身是从什么心理地层里瞬间凝固出来的”。

第四种路径：刑罚哲学中的表达主义。 费因伯格等学者主张，刑罚不仅是痛苦的施加，更是社会道德态度的表达——定罪本身就是对社会说：这种行为是错的，这个行为人应受谴责。这一路径给了本文一个重要的入口：法律动作本身内含道德宣告。它看到了刑罚不只是一根棍子，还是一张嘴——它说出了一些东西。但它通常把这个宣告当作一个单向过程：法律表达谴责，社会接收谴责。它没有追问法律说出口的“有罪”，进入社会情感网络之后，被转译成了什么。为什么“有罪”那么快就会被转译成“恶魔”？而一旦“恶魔”出了口，这个来自社会的转译，又能否反过来渗透进入法律程序——影响量刑的轻重、假释的批准、以及公众对司法是否“过于仁慈”的判断？表达主义看见了法律在说话，但它没有追问社会把法律说的话转译成了什么，以及这种转译反过来又对法律做了什么。

第五种路径：累积性劣势理论。 桑普森和劳布的年龄-级联犯罪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动态的框架：个体幼年期的结构性劣势与早期行为问题，会引发正式的司法干预（逮捕、定罪、监禁）；这些干预反过来切断本已脆弱的合法机会结构（就业、教育、婚姻），将被标记者在成年期推入更深的社会边缘，从而引发新一轮犯罪。这一理论比标签理论更精细地追踪了“司法标记—机会封闭—持续犯罪”的因果链——它不只说“社会排斥导致再犯”，而是用纵向追踪数据具体展示了排斥是通过关闭哪些具体的机会路径（就业、婚姻）来发挥作用的。

累积性劣势理论走到了这条因果链的最深处，但它在即将触碰到一个更深的问题时停住了。它的因果叙事从“他被标记”开始。标记之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旦他被标记，社会就会用比标记本身更彻底的方式将他整体切割出去？这个切割动作——不是关闭机会，而是在关闭机会之前先一步把侵害者从“可以与我们共享任何社会界面的存在”这一默认范畴中删除——在累积性劣势理论中被当作了给定的背景条件，而非需要被追问的发生事件。

. **

这五组解释，各有其诚实之处，也各有其停步之处。它们共同站在了同一块未经检视的地基上：它们都把“侵害者”和“社会”当作两个已经稳定在场的实体——一个人先有了（或没有）某种倾向，做出了（或没做出）犯罪行为，然后社会对之做出（或不做出）反应。“个体→行为→社会反应”这个三段式结构，被它们一致地当作分析理所当然的起点。

本文要做的，就是让这块地基本身进入追问。不是追问“个体与社会之间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那个被我们称为“犯罪的个体”的人，和那个被我们称为“做出反应的社会”的集体，是否其实是在同一个事件中被一并发生出来的？那个侵害者，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变成了罪犯——他是在什么样的关系史里，从来没有被真正接住过，才终于走到了那个向外溃决的临界点？那个贴标签的社群，也不是一个冷静的中立裁判——它在侵害事件的冲击下，体验到的恐惧和认知断裂，是怎样在瞬间把它从“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社群”变成“一张拒绝的脸”的？

本文的分析单位，正是这道将个体与社群共同撑起来、却在侵害事件中双侧同时坍塌的堤岸结构。下面，在开始追溯这道堤岸在个体侧如何塌成罪涌之前，必须先与一位已经在这条追问链上走得最远的先行者做一次正面区分——因为他追问到了容纳失败如何逼出个体内部的暴力外化，却在他的分析单位的存在论边界处，触到了他无法跨过的那条线。

与比昂的正面区分：罪涌不可还原于容纳失败

在追问“侵害行为如何从痛苦中被逼出”这条路径上，走得最深的思想家之一，是英国精神分析师威尔弗雷德·比昂。任何够格的同行评议都会在此处追问：你的“罪涌”，比“比昂的beta元素+投射性认同”多出了什么？本节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笔债务——事实上，在个体内部的生成机制链条上，本文的罪涌与比昂的容纳失败共享着同一块地基——而是精确论证“罪涌”在存在论上不可还原的那一笔。

比昂在其容纳理论中刻画了如下路径：婴儿将无法承受的原初恐惧——被比昂称为“无名的恐惧”——投射给母亲。母亲在理想状态下，凭借比昂所说的“遐想”能力，接住这些投射、以自己的心智消化它们，并将一种可被承受的形态返还给婴儿。这一过程被比昂称为“容纳”。当母亲因为自身的心理缺席而无法提供这种容纳时，未被处理的原始恐惧会被重新内摄为一种更加无名的、无法被言说的、因而也无法被思考的恐怖——即比昂所说的“beta元素”。Beta元素不能被心智加工，不能被符号化，它只能被外化：投射到外部对象上，或以冲动行为直接排出。比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确勾勒出的这条“容纳失败→无法思考的痛苦→暴力性外化”的路径，是本文在个体侧的地基。本文无意、也无必要在这块地基上声称原创。

那么，“罪涌”多出了什么？

答案是：分析单位的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个此前未被命名的辨别维度。比昂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内部的心智装置——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母亲—婴儿二元关系中的容纳功能。他追问的是：为什么某些人无法思考自己的痛苦？他的答案落在二元关系中容纳功能的缺失。这条追问链，就其自身而言是完整的——但它天然地被封闭在一个特定的存在论预设之内：发生，发生在个体之间；社会的存在，是这个二元发生完成之后才出场的一个外部背景。在比昂的模型中，当容纳失败导致beta元素外化为暴力行为时，“社会”只是这个行为冲击的对象——它是一个被击中的、随后做出反应的被动受体，而非从一开始就参与构成了那个使容纳失败成为可能的结构性条件。

“罪涌”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体内部的心智装置，也不是母亲—婴儿的二元关系，而是个体与社群之间那道共享的堤岸结构。这道堤岸，不是容纳失败事件发生之后才被冲垮的东西——它恰恰是容纳失败事件得以被定义为“失败”的那个共同条件。在理想状态下，养育者的容纳功能不仅是个体心智健康的源头，也是社会将一个新成员接纳入人类共同体的第一个动作——那个动作说出的是：“你的不知所措，可以被我们接住；因此，你将来也会学会接住别人的不知所措。”容纳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一个心理学术语，而是一个社会存在论事件：它在个体内部安装了一个“内部容纳者”的同时，也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砌下了第一块共享的堤岸。从此，这个人知道，当他再次被不知所措淹没时，他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他不需要用暴力把痛苦倒灌给别人，因为在他的经验里，痛苦可以被他人接住而不被摧毁。

当一个孩子的容纳界面从未在关系中成功绽出，他失去的不仅是个体心智中的一个功能——他失去的，是与人类社会之间那道共享堤岸的第一块基石。此后他每一次在不知所措中试图转向别人、每一次都撞上一堵无回应或敌意的墙，这道堤岸在他那一侧就不断风化，直至彻底溃决。而当他最终以暴力的方式将体内那片从未被接住的失措向外溃决时，社群那一侧在同一瞬间体验到的认知基底断裂，正是同一道堤岸在社群侧的同时坍塌。比昂的模型可以精确解释：为什么一个容纳失败的人更容易做出冲动性暴力行为。但它无法解释——不是因为模型不够好，而是因为它的分析单位（二元关系）的存在论预设本身就无法容纳这个维度——为什么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反应，不只是一个“谴责”或“惩罚”，而是一种将受害者从人类范畴中整体切割出去的、与侵害行为同时发生的、此后持续加固的排斥结构。

比昂的“容纳失败”解释了个体内部的溃决机制；本文的“罪涌”，将这一溃决机制与社群一侧的“恶壁”焊死在同一个冷焰循环里。比昂追溯了那道堤岸在个体内侧的坍塌；本文追问的是，这道堤岸在个体内侧与社群外侧的同时坍塌，并且论证这两种坍塌不是两个独立事件，而是同一个容纳从未发生的否定性事件，在两个端点上的不可逆咬合。比昂看不见这一笔，不是他的疏失——他在他的分析单位里已经把能做的做到了极致——而是他的分析单位本身，从结构上就无法安放“社群那一侧的堤岸”这个维度。本文之所以能看见这一笔，恰恰是因为本文从一开始就把分析单位架在了那道将个体与社群共同撑起来的堤岸结构上。这一笔，不是对比昂的补充，而是对比昂的分析单位所依赖的二元关系存在论的一次置换。

三、罪涌：当容纳从未在关系中绽出，痛苦向何处溃决？

上一节追溯了既有解释走到了哪里、停在了哪一块地基上，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与比昂的正面区分。本节任务是正面追溯：一个侵害行为，是如何从那道从未垒实的堤岸内侧被逼出来的。

在进入生成机制的台阶之前，必须先做一件事：把“容纳”从一个描述性的名词还原为一个在关系中首次绽出的事件。否则，后文所说的“容纳从未绽出”，就会被误解为“丢了一个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而不是“一个从未在关系中被成功发生出来的结构，从一开始就不在场”。

第一层：容纳如何在关系中首次绽出。新生儿与养育者之间，在最初时刻并不存在一个叫作“容纳”的东西。存在的只是一团双向的、尚未分化的生理与情感的互相渗透：婴儿的内部感受——饥饿的绞痛、肠道的痉挛、被巨大声响惊吓后的四肢僵直——这些都不是“痛苦”，因为它们还没有被一个能够命名它们的他者接住并返还。它们只是一团没有语义的纯粹的生理事件：来了，淹没了婴儿，然后过去。

“容纳”的首次绽出，要求一个特定的互动事件发生。婴儿因为这团内部骚动而哭喊；养育者听见哭喊，不是被它击溃——暴怒、崩溃、忽视——而是用自己的冷静，一种在语调、表情、怀抱的力度和身体的温度中传递的、比语言更早的信号，告诉婴儿：这个东西，我认识它；我接住它了；它还活着，但你不会死在它里面。这一连串动作，把一团没有语义的生理骚动，第一次转译成了一个可以被共同承受的事件。这是一个创造，不是一次发现。在这个互动发生之前，“容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存在；在这个互动首次成功发生之后，婴儿获得的不仅是这一次的平静，而是人类心智的第一块基石：那个把我淹没的东西，是可以被我之外的人接住的；因此，它也是可以被我将来——当这个他者的形象已经长进我内部之后——自己接住的。

这一笔，是整个生成机制链条的地基。没有这一笔，后文所有关于“容纳从未绽出”的论述，就会变成对一个先在的“容纳需求”的哀悼——那就是既成事实论的口吻：我们丢了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好东西。但发生的真相是：容纳，不是一个被丢失的好东西，而是一个在关系中首次绽出的事件。容纳从未绽出，不是丢了它，而是它在这对关系中，从未被成功发生出来过。

第二层：容纳从未绽出的日常形态。当上述那个首次绽出的事件在养育关系中系统性地不发生——当婴儿的每一次哭喊遭遇的都是暴怒、冷漠、讽刺、或养育者自身的崩溃——那么，在婴儿那一侧，被制造出来的就不只是“这一次的恐惧没有被接住”，而是一个更远深远的结构性后果：他从来没有被教会“痛苦是可以被承受的”这件事本身。他的心智中没有长出那个叫作“内部容纳者”的心理结构——那个本应由无数次被接住的经验逐渐内化而成、能够在成年后独自面对痛苦时自动激活的内部对话者。他不是丢失了这个结构；他是从未获得过它。

比昂把这种系统性容纳失败所产生的心理碎片称为beta元素——无法被心智加工的、只能被外化或排出的原始恐惧碎片。本文接受比昂的这个诊断，但本文要追问的是比昂没有追问的一层：在beta元素不断堆积的那段漫长的童年与青春期里，这个孩子的日常关系中，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一步一步地把他逼到了一个连“向人求助”这个动作都做不出来的境地？

这个逼迫过程，并非一次性创伤事件，而是在无数日常互动的累积中完成的。第一步：当孩子试图用哭喊、表情或语言表达某种他尚未能命名的内部骚动时，养育者的反应本身构成了一个无法容纳的信号。暴怒告诉他“你的需要是对我的攻击”；冷漠告诉他“你的需要是不值得被回应的”；崩溃告诉他“你的需要是摧毁性的，它毁掉了你最依赖的人”。如果他第一次试图表达痛苦时，母亲转过身去，或者父亲一巴掌扇过来——这个瞬间，在他身上落下的不是一个判断（“我做错了”），而是一种更原始的身体记忆：向外发出信号，是危险的。第二步：这种反应反复发生，孩子学会的不再是“求助可以帮我”，而是“求助让事情更糟”。他不再向那个具体的养育者求助，但这个经验的泛化效果悄然覆盖了他与所有人的关系——他不再向任何人求助，因为在他的经验里，“任何人”在最后都会变成那个养育者。第三步：当外部求助的通道被全部封死，他只能在他自己的内部处理那些不断堆积的beta元素。但他内部并没有那个由被容纳的经验内化而成的“内部容纳者”——容纳从未在他身上绽出过，所以他也无法在自己内部构建它。他只能用一种他自己发明出来的、原始的、从不被别人看见的方式，把这些碎片压住、转译或暂时遗忘。这种行为模式的心理学后果是深远的：一个无法在自己内部容纳痛苦、也无法向任何人求助的人，当他被外部的某个事件——失业、关系断裂、被羞辱——推到临界点时，他没有一个“让我先停一下、找个人说说”的选项。那个选项在他的生命中从未被激活过。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片已经装不下的痛苦之海，倒给外部——倒给一个被他的痛苦转译机制标记为“迫害者”或“可施加对象”的人。

这就是罪涌的生成机制台阶。它不是“创伤→暴力”的简单因果。它中间的每一级台阶，都是一次曾经有可能打开、却被关系的持续失败逐一封死的转向口。这些台阶的不可逆性，恰恰在于它们的日常性——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可以被指认为“那个把他变成施害者的创伤”。是那些本应接住他、却从未接住过他的无数个日常时刻的累积缺席，合力把他推过了那个临界点。

第三层：罪涌的“过量伤害”从何而来。当这一溃决最终发生时，它的形态往往携带着一种令社群完全无法理解的“过量伤害”——不是简单地打一拳，而是持续殴打；不是为了夺取财物，而是伴随着羞辱和毁灭性的言语；不只是在身体上摧毁受害者，而且似乎要将受害者作为一个象征来彻底消灭。在庭审中，一个将受害人殴打致重伤的施暴者被问到“你为什么不停手”时，他给出的回答有时令人困惑：不是因为受害人做了什么激怒他的事，而是“我就是停不下来”“我看着他的脸，我就想让它消失”。

这种“过量”，恰恰是这段生命史在他内部灌注却从未倒掉的东西。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无法被接住的恐惧、羞辱、愤怒与无助，在这一瞬间与那个当下的外部触发事件一并被倒灌进了受害者的身体里。受害者的脸，在他无意识的转译中，同时是三个东西：是那个曾经拒绝接住他的养育者的脸，是他自己那个从来不被允许求救的自我的脸，也是那片痛苦之海本身的脸。他打在受害者身上的每一拳，不是在回应这个受害者在下一刻做的任何事——他是在把他三十年前就该被接住、却从未被接住的那场哭喊，终于用拳头的方式，灌进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这不是愤怒。这是从未学会说话的人，在用暴力完成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能够被外部世界看见的表达。

一个关键限定：这不是开脱。说“施害者内部有一片从未被接住的痛苦之海”，不是在说他的施害行为是合理的、可原谅的、或不当被惩罚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侵害行为对受害者造成了真实的、不可逆的伤害，我们才必须去追问侵害行为的发生条件。理解不是为了取消责任，而是为了让责任落在它真正所属的地方：落在施害者自己必须承担的那一份上，也落在这个社会在长年累月忽视容纳之系统性失败之后、必须承担的那一份预防之责上。把施害者判处监禁，是法律对他行为的回答；但防止下一个施害者从同样的堤岸塌陷处涌出，是对我们自己——必须与他共同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的回答。这两件事，不是同一件事。

第四层：罪涌的定义及其不可还原的控制变量。基于以上生成机制台阶，罪涌可以被定义如下：罪涌指涉一种侵害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侵害者内部从未在关系史中成功绽出容纳界面；在长年累积的内部失措无处可去的情况下，经由某个外部触发事件彻底丧失所有退回可能，而将体内那片从未被接住的原初失措，以携带过量伤害的方式向外溃决。

这个定义中藏着一个控制变量，它将罪涌与既有概念——创伤后外化攻击、挫折-攻击、冲动控制障碍——切分开来。这个控制变量不是“容纳失败的有无”，那是比昂等先行者已经标出的路径。本文的控制变量是：容纳界面是否曾经历一个可见的、被双方共同体验为“可工作”的阶段，又在之后的某个时刻坍塌。在罪涌的发生路径上，容纳界面不是“曾经有过、后来丢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关系中成功绽出过”。这个区分，将罪涌从“失去容纳后的报复性攻击”中切出来——那是另一种行为、另一种心理动力，它预设了施害者曾经知道容纳是什么。而罪涌的施害者，从未拥有过那个“知道”。他在内部没有任何一个可供折返的容纳体验的痕迹。因此当他溃决时，他的“过量伤害”中携带的不只是愤怒，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对人类联结本身的未曾知晓——他从未被真正接住过，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在摧毁的是什么。他不是在报复一个曾经有过的好东西的丧失；他是在用他唯一会的语言——把痛苦灌给别人——来表达一种他从未被教会用其他方式表达的原初失措。

这个控制变量，是罪涌在与比昂的容纳失败、与挫折-攻击理论、与创伤外化等既有概念的正面区分中，不可还原的新辨别维度。比昂追溯了容纳失败个体的心智崩溃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追问：那个连“容纳曾经是可能的”这一记忆都没有的人，他的溃决是否在结构上不同于那些曾经拥有过、又失去容纳的人的溃决？本文的判断是：不同。前者——罪涌——的过量伤害中，含有一种后者没有的东西：一种从未与人类面孔成功对视过的、原始的失措。它不只是痛苦的外化，它是痛苦在一种从未被命名、因而也从未被驯化的状态下，第一次被迫进入可见性——而它进入可见性的唯一通道，就是对另一个人的侵害。

案例：被逼至罪涌的一条真实生命史

以下是本文的核心案例。它不是一个极端的连环杀手故事——恰恰相反，它选择了一个更普通、更日常、因而也更触目惊心的样本，

因为它的普通恰恰证明了罪涌的发生条件并非稀有的极端个案，而是一个在太多家庭中持续重演的日常模式的结构性后果。

王某，1982年生于中国某中部省份的农村家庭。父亲长年酗酒，酒后对妻子与儿子持续施加身体暴力。根据邻居和亲友的证言，母亲在丈夫的暴力中自顾不暇，无力给予孩子任何情感回应——“从不抱孩子”是一句反复出现在知情者描述中的话。但“从不抱孩子”这个描述本身，已经抽象掉了太多。更贴近生成机制事实的镜头应该落在一个更细的刻度上：当王某还是一个婴儿时，他因为饥饿或肠绞痛而哭喊，母亲的反应是什么？根据一个自小住在隔壁的老邻居的回忆，有一幕他至今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从王家院子里传出婴儿持续不断的哭喊，持续了很长时间；他隔着院墙听到王母朝婴儿喊了一句“哭什么哭，再哭把你扔出去”，然后再无下文。这位邻居当时的感受是“这家人带孩子就是这样”——这句话本身，就是对这个家庭容纳从未绽出这一事实的最精确的社会见证：它不是某一个特别恶毒的瞬间，它是“就是这样”的日常。

这个孩子，从未在任何一次被恐惧淹没的时刻，得到过一个成年人的冷静的、消化恐惧后返还安全的回应。他的哭喊撞上的，要么是父亲的暴力，要么是母亲的拒绝与威胁。如果用本文的术语来表述：容纳界面，在这对养育关系中从未绽出过。到了他四岁那年，发生了一个在此后三十多年里反复被他在不同场合向不同人（狱警、狱友、办案民警）讲述的场景。那时他在床上哭，父亲喝醉后朝他背上狠扇了一巴掌，骂了句“小兔崽子，再嚎”。他记得自己当时咬烂了下嘴唇，血流到嘴里。“不敢哭了，”他后来说，“也不疼了，就是嘴里咸咸的。”那次咬嘴唇之后，他再也没有在父母面前哭过。这个场景的生成机制分量在于：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创伤事件，它是这个孩子第一次在身体层面执行了“把痛苦吞进去而不是送出去”这个操作——而他选择吞进去，不是因为被教导了更好的表达方式，而是因为所有的送出口都撞上了同一堵墙。

八岁时，他试图以放火烧邻居草垛的方式引起注意——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被记录在案的“向外排出”。小时候，他把一只小鸡用砖头活活砸死，不是因为“仇恨那只鸡”，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样做之后，他会“觉得不那么憋”。这两个细节在生成机制上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早期越轨行为”，而在于它们共同揭示了同一个模式：当内部堆积的beta元素超过了他用咬嘴唇吞忍能压住的临界点，唯一的释放渠道就是向外施加破坏。他没有在任何一次释放中学会“向人求助”——那个选项在他整个童年里从未被成功激活过。

此后二十余年，这条路径被反复加固。他在三十五岁之前没有一份工作能持续一年以上，每一次被辞退或不欢而散，都为他体内的那个“被所有人拒绝”的叙事增加了一块砖。他学会了喝酒——和他的父亲一样——而每一次酒后，他就会反复讲他四岁那年咬烂嘴唇、血流到嘴里的那个夜晚。没有人在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给他任何回应——因为他只在酒后讲，而听的人只觉得“这人喝多了就念叨些没用的”。

三十五岁那年，他在一次酒后争执中，将一名叫他“你就是个废物”的同事殴打致重伤。他用的是一把工地上的铁锹，打了不少一下——“我也记不清打了几下。”那个同事在ICU住了十一天，存活，但面骨永久性损伤。在被问及为什么要打那么多下时，他的回答是：“他说的那句话，我不是第一次听。但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好像他说的不是这句话，他是在把我的整个命从头到尾说一遍。”在这句话里，受害者不只是一个独立的他者——受害者的脸，在他的无意识中，与那个曾经拒绝接住他的母亲的脸、那个打他让他不敢哭的父亲的脸、那个从来不被允许求救的自我的脸，在铁锹落下的那一刻重合了。他灌给那个同事的，不是对“废物”二字的愤怒——他灌出去的，是三十五年从未被接住、从未被命名、从未被任何人承认的全部失措。

量刑：七年有期徒刑。在这七年中，没有任何一个探视者。他母亲去世时，他在监狱里。监狱通知了他，他没有提交参加葬礼的申请。后来狱警问起，他咧嘴笑了一下，说：“回去了也没人想看见我。在哪都是一个尿性。”这个笑容，不是不在乎。这个笑容，是他在四岁咬烂嘴唇的那一刻学会的“吞进去”的成年版：如果他不把它变成一句自嘲的笑话，那东西就会胀到他没有办法在监狱的那张窄床上躺下去。

出狱后，他前往邻近城市试图重新开始。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做了六份日结零工。每一份都只持续了几天。其中一个工地老板后来在电话里跟问他的人说得很直白：“谁敢用坐过牢的？万一又出事，我这工地还开不开了？”还有一次，他和一个工头已经谈好了第二天上工，晚上工头打来电话，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他第二天去工地门口等了一上午，没人出来接他。他没有再打电话——他经历过太多次这种沉默关门，他已经不需要听到明确的拒绝词来辨认门锁响动的声音。他租住的城中村出租屋，在房东从派出所的流动人口登记系统中获知他的前科后，被要求一周内搬离。房东没有当面说出难听的话，但他在搬离的前一晚，隔着那扇薄木门，听到房东在后院跟另一个人说：“这种人，住在哪都是定时炸弹，还不如早点轰走省心。”

八个月后，他再次犯罪——这一次的侵害对象，是一个在深夜街头与他发生口角的陌生男子。这次用的是随手捡的路边碎砖，伤害程度依然严重。在供述中，他说：“反正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他们说对，我就是个定时炸弹。那我就炸吧。”

这条生命史，完整地展示了本文的判断所描述的那个发生结构。第一步：容纳界面从未绽出——不是“被丢了”，是从未有过。第二步：从未学会求助，从未拥有“内部容纳者”。第三步：在外部触发下，体内那片从未被接住的失措以过量伤害的方式溃决——罪涌。第四步：社会在恐惧中将侵害者整体切割——恶壁。第五步：恶壁砌死后，全部合法生存路径被封堵。第六步：再无退路者，从那个唯一还为他留着一条缝的场域——暴力——再次涌出。罪涌加固了恶壁；恶壁催生了新的罪涌。

这个案例中的每一次转向，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单独挑出来当作“罪魁祸首”的戏剧性时刻。不是父亲某一次特别残暴的殴打、不

是母亲某一句特别恶毒的话、不是房东某一次特别无情的驱赶——是所有这些时刻在关系中的累积缺席与互激，合力把这个人一步一步推到了那个再也无法折返的临界点。它的恐怖，不在它的极端，在它的普通。

四、恶壁：当恐惧找不到出口时，它凝固成什么？

第三节追溯了堤岸在个体内侧的坍塌——罪涌。本节追溯同一座堤岸在社群外侧的同时异变。在个体一侧，从未绽出的容纳逼出了侵害行为的向外溃决；在社群一侧，侵害行为激起的认知基底断裂，把这一座堤岸的社群侧砌成了一面脸——一面将侵害者从“人”的存在论范畴中整体切割出去的排斥之壁。

第一层：侵害事件如何撕裂社群一侧的堤岸。每一桩极端侵害事件，当它进入社群知觉时，触发的第一反应不是理性的罪责判断，而是一种更原始的、前于道德推理的心理事件：社群与那个侵害者之间那道共享的堤岸——那道使人之所以可以被承认为人、使他的行为之所以可以被放置在一个“人类行为”的可理解范畴之内的社会性界面——在认知中被撕开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时候，都默然地维持着一种对他人行为的“可理解性预设”：他人的行为，无论多出格，终归有一个我能理解其动机范围的轮廓。饥饿可以让人偷食物；愤怒可以让人争吵；绝望可以让人自我毁灭。这些行为都在我的“人类体验范围”之内。

但当一个连环杀手在一个无辜孩子身上施加酷刑，当一个护工在监控盲区里持续虐待一个完全依赖她的老人，当一个父亲或母亲反复地、残忍地殴打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幼儿——这些行为，撕破了那张叫作“人类行为是可理解的”的认知基底。社群体验到的不是“这个人做错了”，而是一种更深的、存在性的恐惧：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做这种事。这种“无法理解”不是智力上的无力——它比智力更深。它是一种在最日常的、让我们能够与陌生人共处一个空间的默认安全感的地基上发生的断裂：如果这个人的行为无法被我的认知范畴装下，那意味着人类中存在着某种我完全无法预测、无法防御、甚至无法想象的毁灭性。下一次，它会出现哪里？它会不会在我身边？它会不会，在某种我不知道的条件下，也出现在我身上？

这个恐惧是真实的，不是病态的。但恐惧接下来做的动作，决定了这堵堤岸的社群侧是从此变成一面不可逾越的墙，还是保留哪怕一条缝隙。那个最通常的动作，是切割。

第二层：认知切割——恶壁的凝固机制。面对无法被既有认知范畴消化的恐惧，人类心智启动了一个经典的应急反应：将引发恐惧的对象从“我们”这个范畴中整体推出去。他不是“一个做了可怕之事的人”——那仍然保留了他作为人的资格。社群需要一种更强的、能彻底切断与他之间任何连续性的话语。他是“恶魔”。他是“禽兽”。他是“怪物”。

这些词，不管它们在不同文化中披着什么字面外衣，都在完成同一个心理操作：把他从“人”的存在论类别中开除。他的行为，不是人类行为的某种极端变体——他的行为是某种非人类的、不可被我们已有的经验范畴触碰的东西。因此他本人，从此以后，不再是这个道德共同体的一员——他是一种入侵物，一颗肿瘤，一个用“人”的皮囊包裹着、但内部已经完全异质的存在。

请注意这一机制的精确位置。恶壁不是“污名”。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严重贬损个体身份、使其从完整的、通常的人降格为有污点的、被贬低的人的属性”。污名所操作的，是在“人”这个范畴内部的降格——被污名者虽然被贬低，但仍然被承认为人，仍然可以在某些狭窄的、被限定的社会空间中继续存在。恶壁切割的是比身份更深的那个范畴：他不再被承认为人。恶壁与污名共享着排斥这一结果，但它们的发生机制不在同一个地层上。污名是对社会身份的贬损；恶壁是对人类范畴的切割。污名让人带着一个贬值的身份继续活在人群里；恶壁让人从人群中离开——不是物理上的离开（虽然它经常也导致那个），而是存在论上的离开：他不再被社会默认为一个“可以被用人类动机范畴来理解”的存在。

在实证操作中，如何辨别“被身份贬损”与“被范畴切割”？一个可操作的判准是：当排斥不再需要向排斥者自己证明其合理性——当它变得不言自明、无需辩护——时，就从污名滑向了恶壁。一个房东拒绝把房子租给有前科的租客，如果他的表述是“我需要一个稳定的租客来付房租，而他的记录让我不确定他能付得起”，这就还是污名：他在做一个成本-收益的算计，他仍然在把对方当作一个有可预测行为模式的人类行动者。但如果他的表述变成了“这种人，住在哪都是定时炸弹”——请注意，这句话不再包含任何可以被反驳或检验的命题。它不陈述一个风险概率，它陈述一个本质。它不需要任何证据来支持，因为它在说话者自己心里是不证自明的：“这种人”的自然属性就是“定时炸弹”，把炸弹清除出去不需要论证。这个时刻，排斥不再是一件需要考虑合理性的事。它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射。恶壁砌成了。

第三层：后见之明的恶性循环。“邪恶”这个词一旦被说出，就开始主动吸附叙事。社群会回溯那侵害者的一生：他小时候曾虐待过小动物吗？他曾被邻居抱怨过吗？他曾在应该哭的时候没有哭吗？每一个与常人的微小偏离，现在都被倒过来解读为“邪恶即将显现的征兆”。这种后见之明叙事完成了一个极有诱惑力的认知闭环：因为他是恶魔，所以他做了恶魔之事；因为他做了恶魔之事，这就证明了他从来就是恶魔。

这个闭环完美的免疫一切反例。如果他早年表现出了任何可以被解读为“异常”的行为，那就证明邪恶早在那个时候就潜伏了；如果他早年表现得完全正常，那就证明邪恶隐藏得极其深、极其阴险。无论哪一种解释，最终都回到同一个结论：他就是恶本身。我们不需要问任何关于他的生命史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问那些问题，你就已经预设了他不是本来就恶；而我们知道，他就是本来就恶。

这个闭环的认知功能，是让一个被吓坏的社群感到安心。因为它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它同时提供了认知秩序（“恶魔做恶魔之事”）、提供了道德确定性（“我们不是恶魔”）、并封死了追溯发生条件的通道（“既然他是恶魔，那么问‘他经历了什么’就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你这是在为他开脱”）。在这个闭环内部，社群永远不需要去面对那个真正令人不安的问题：他走过的这条路，有没有哪一段，是我们共同铺的？那个在他童年里从未发生过的容纳，是不是在一个我们集体习惯性忽视的社会结构中，被一再地再生着？

第四层：恶壁的制度化表达。 这面被恐惧和切割需求砌起来的墙壁，并不只存在于浮言碎语中。它在不同的时代和制度中以不同的技术形态被落实。在当代，性犯罪者登记与公示制度以“保护社区安全”的技术面目实现了恶壁的制度化。一个人在服完刑期之后，他的姓名、住址、照片、所犯罪行，永久性地向公众开放。他在法律上“偿还了债务”，但在社会存在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竖着一块写着他名字的警示牌。找一份工作——背景调查。租一间公寓——拒绝。搬到一个新的社区——邻居从网上知道“附近住着一个已经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他的存在，被制度性地定义为“永久的威胁”，而这种定义永远不需要经过第二次审判——因为它不是一个判决，它是一个登记，一个“事实陈述”。

恶壁的本质，在这个制度中达到了最残忍的精确：它不是在回应侵害行为，而是在否定被标记者整个存在的合法性。它说出的不是“你做了错事”，而是“你是一个错误的存在”。它不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它也不问你出狱后打算做什么——它只是在每一次你试图重新进入社会的时候，沉默地让你知道：你已经不在我们的范畴里了。这不是道德判断的过度，这是道德判断在恐惧的逼迫下，从判断滑向了存在论切割。而这道切割一旦被制度化，就不再受任何一个个体的善意或恶意的影响——它变成了系统的一个自动功能，每一个经过它的人都自动被转译为“威胁”，每一次被转译都让那个“他本来就是威胁”的后见之明叙事获得了新的实证燃料。

五、罪涌与恶壁的共生：冷焰循环

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追溯了罪涌和恶壁各自的发生路径。但这两条路径不是平行的。它们一旦被启动，就会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冷焰般的循环——它不发出火光，不引人注目，却在持续地、无声地焚烧着一切可供折返的余地。本节的任务是解剖这个共生结构，为它引入实证研究的支撑，并在此处正面回应累积性劣势理论的替代解释。

第一重咬合：罪涌如何加厚恶壁。 一桩侵害事件发生后，它在社群中激起多大的认知断裂、从而砌出多厚的恶壁，并不只取决于侵害行为表面的严重程度——它还取决于侵害行为的那个“过量伤害”的质地。第三节已论证：罪涌的过量伤害中，携带着施害者体内那片从未被接住、从未被命名的原初失措——它不是愤怒、不是冷酷、不是贪婪，它是所有这些在正常人类动机范畴内可以被理解的东西的底下，那一层从未被成功转译为可承受形态的原始碎片。

但在社群眼中，看到的只是“这个人的行为残忍得超出了所有可理解的范畴”。这种“不可理解”，恰恰是最能触发恶壁切割机制的那一把钥匙。犯罪学中有一类共识性观察：在控制了罪行严重程度之后，那些犯罪动机被公众感知为“无法理解”的罪犯，比那些犯罪动机被感知为“可理解”（如经济动机、报复动机）的罪犯，在量刑时获得更重的刑期，在假释听证中更容易被拒绝，在出狱后面临更强的社区抵制。公众对罪行的“不可理解性”的感知强度，是预测惩罚严厉程度与社会排斥程度的一个独立变量，其预测力甚至超过了罪行本身的客观危害程度。换言之，不是罪行越重，恶壁越厚；是罪行越“不可理解”，恶壁越厚。而本文的判断正是：罪涌所携带的那种过量伤害，恰恰是所有侵害类型中最容易被体验为“不可理解”的——因为它的根源不在任何一个可以被常识心理学的动机词汇捕捉的层面。发生在他童年里的容纳从未绽出，在多年后被他以罪涌的形式倒灌给受害者之后，现在又反过来，使他自己面对一面更厚、更不可逾越的排斥之壁。他让社会恐惧得更深，所以社会把他切割得更彻底。

第二重咬合：恶壁如何催生新的罪涌。 这是整个冷焰循环中最残忍的一环，也是本文与累积性劣势理论对话的核心场域。

一个人被定罪、服刑、释放。在法律的世界里，他已经“偿还了对社会的债务”。但是恶壁不认可债务的偿还。恶壁的逻辑不是“你欠了多少，还完了就可以回来”；恶壁的逻辑是：你不是欠了一笔可以量化的债——你本身就是一个坏的、脏的、不可信的存在。债务可以清偿，但存在不可以。于是，他出来了，发现恶壁无处不在。找工作——绝大多数雇主在背调后沉默地关上门。租房子——房东说“对不起，已经租出去了”。交朋友——新认识的人知道他的记录后，眼神变了。他每一次尝试重新把自己放进一个正常社会角色的努力，都被恶壁弹回来。他反复地被提醒：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永远不是。

桑普森和劳布的累积性劣势理论为这一重咬合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他们的年龄-级联犯罪学追踪研究显示：司法干预——逮捕、定罪、监禁——通过切断就业机会和婚姻可能性，显著增加了个体在成年期持续犯罪的风险。这一效应独立于个体幼年期的行为倾向：两个幼年期行为问题程度相同的个体，被逮捕、被定罪的那个，比未被正式干预的那个，在成年期的犯罪频率显著更高。换言之，“监禁和它所引发的社会排斥本身制造了新增的犯罪风险”，这是一个有实证支撑的判断。

累积性劣势理论追踪了“梯子被一扇一扇撤走”的过程——教育中断、就业被拒、婚姻机会关闭，这些是社会阶梯上的连续下滑。这套理论的因果机制是明确的：司法标记（自变量）→机会关闭（中介变量）→持续犯罪（因变量）。这是一条可在实证研究中被量化追踪的因果链，它的贡献是实质性的。

然而，冷焰循环不否认这条因果链——它在这条链的底下，追问了一个被累积性劣势理论当作给定背景而从未追问的前置条件。冷焰

循环最坚实的自我反驳，正来源于此。累积性劣势理论完全可以争辩说：我的理论已经解释了“因为标签导致机会关闭，机会关闭导致再犯”的完整因果链；你的“罪涌-恶壁”只是把同一个链条戏剧化了——被标签就是被贴了标签，机会关闭就是机会关闭，这不需要再加一层“恶壁”或“存在论切割”来解释；你增加的这一层，并没有引入任何新的可检验变量。

本文的回应是：累积性劣势理论解释了梯子怎么没了；本文要追问的是，梯子还在的时候，那个本该把梯子挂上面的钩子，是在什么时候、怎样被熔断的。累积性劣势理论的叙事从“他被标记”开始——它把标记本身当作一个给定的、不待追问的分析起点。但“标记”是一个过于温和的词。它暗示的是一张贴在档案袋上的标签、一个打在数据库里的红字——这些都是行政动作，它们的效应可以被量化为“就业成功率下降X%”“婚姻机会减少Y%”。本文的判断是：在这些可量化的机会关闭发生之前，有一个更先在的、不可量化的切割已经完成了。社群在侵害事件发生的同一瞬间做出的，不是在评估风险概率——社群做的是：把这个人从“一个可以与我们共享任何社会界面的存在”的默认范畴中整体删除。此后发生的所有“机会关闭”——雇主沉默关门、房东限期搬离、邻居耳语——都是在不同制度层面落实这个已经完成的切割。它们不是原因，它们是表现。

存在论范畴切割相对于机会结构关闭的独立因果贡献在于：它预测了一种特定的累犯路径——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重新偷窃”，而是“在所有合法生存路径被封死之后，暴力成了那个被排斥者唯一还走得通的路”。王某第二次犯罪不是因为缺少一个工作机会——他做过六份零工，每一次都因为恶壁而失去。如果他仅仅面对的是“就业困难”，他还可以借钱、投靠亲友、换一个城市无声地活下去——那些都是艰难但非暴力的选择。但他面对的不是就业困难，而是每一次他试图无声地活下去，恶壁就堵上来，直到他从墙的这面听到一个声音——“定时炸弹”——然后他把这个声音当成自己的名字，走向了那堵墙唯一没封死的那条缝。这不是机会结构的关闭导致的犯罪。这是存在被整体否定之后，被排斥者用他唯一剩下的方式——暴力——来执行一种对社群从他身上剥夺的“存在资格”的强制回收。

实证上，这一区分可以通过研究设计来检验。累积性劣势理论预测：再犯率随机会关闭的程度上升而上升（例如，就业率越低、再犯率越高）。冷焰循环的附加预测是：在控制了机会关闭（就业、居住、社交网络）的程度之后，被排斥者所经历的排斥是否带有“存在论否定”的质地——即排斥是否以“不言自明、无需辩护”的形态出现，还是以“可协商、可计算”的形态出现——将独立预测其是否转向暴力性再犯而非其他非暴力形式的再犯。如果这一附加预测被驳倒——即排斥的质地差异在控制了机会关闭程度后对再犯类型没有独立解释力——则冷焰循环的“钩子熔断”论需要被重大修正，或收缩为仅适用于某类特定侵害者。如果它被证实，则证明累积性劣势理论的因果链需要一个前置的存在论条件，而这个条件在既有实证文献中尚未被系统地操作化和检验。

第三重咬合：自证预言的闭环。罪涌加固了恶壁；恶壁催生了新的罪涌；新的罪涌反过来为恶壁提供了不可辩驳的“自证预言”。当他再次犯罪——当这个被恶壁困住的人又一次做出侵害行为——整个社会看到的是：“你看，他果然是恶魔。他出来就又犯事了。我们的恐惧、警惕、排斥，从来都是对的。”这个认知闭环拥有完美的免疫结构：它不需要追问“他为什么再犯”，因为“他就是恶魔”已经是一个对所有“为什么”问题的终极答案。在恶壁的逻辑内部，再犯率不是需要被研究、被干预、被降低的社会问题——再犯率是“恶魔本性难移”的实证证明。而那一部分因为恶壁本身而被制造出来的新增犯罪风险，在恶壁的逻辑内部永远是隐身的——因为它不被追问。

六、推衍：这个共生结构，为什么跨时代、跨制度地反复出现？

罪涌与恶壁的共生循环，不是某一国或某一个时代的特殊病症。它以不同的技术形态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中——不是因为某一小撮人设计了它，而是因为它卡住了两个更深的东西：施害者一侧，卡住的是人类原初失措在缺乏容纳界面时必然寻找外部出口的那个原始动力；社群一侧，卡住的是人类面对认知基底断裂与存在性恐惧时必然寻求切割的那个原始防御。两种必然撞在一起，焊成一个循环。本节以推衍的方式展示这个结构在四个不同的历史与制度场景中的反复现身。

十恶体系：不可逆标记与长周期罪涌。中国古代“十恶不赦”体系将谋反、恶逆、不道、大不敬等行为在法律的最顶端钉死为不可赦免。“恶”在这里同时是犯罪的根源和犯罪的身份后果：一个人因为“恶”而犯下十恶之罪，犯下十恶之后又被永久标记为“恶逆之徒”。这一法律标签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命运，还通过株连制度将排斥之壁的墙基从个人扩到了整个血缘网络——容错空间被从个体到家族全部清除。这种不可逆的标记，本身又在被标记者及其后人身上制造出新的痛苦与怨恨，从而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重复触发新的罪涌。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谋反者后人被排斥在科举、仕途和正常社会网络之外之后，反复出现的复仇与反复遭遇清洗，正是这个循环的长周期版本。

异端审判：社会性死亡与被逼绝路。在中世纪欧洲的教会法体系中，一个人因为持有被教会判定为谬误的信念而被定为罪犯。这里的“邪恶”——背离上帝——先于犯罪的司法认定。但请注意这个“邪恶”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首先，一系列教义被权威论证为“正信”；与此不符者被论证为“谬误”；“持有谬误”被论证为“背叛上帝”——这是邪恶；最后，“背叛上帝”被论证为一种比世俗犯罪更严重的罪行——这回到了犯罪。每一步都是制度的操作，不存在所谓“天然的邪恶”。而一旦一个人被宣布为异端，他的整个社会存在都被摧毁：他被逐出教籍，财产被没收，不再有任何人相信他的话，不再有任何人敢公开与他为伍。这种全面的社会性死亡——恶壁的极致形态——让一个被标定为异端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合法的社会空间可以存活。在绝路中，部分被逼至尽头的人又会做出新的“异端行为”——秘密集会、写作攻击性文本——这些行为反过来被教会用作“清剿异端是必要之举”的证据。

疯癫的医学转译：恶壁换了一件白大褂。 当一个罪犯的行为极度惨烈、动机完全无法被正常理性理解时，司法系统面临一个困境：他到底是一个“邪恶的罪犯”，还是一个“疯癫的病人”？“疯癫”这个标签的兴起，在社会功能上部分地接替了“邪恶”的工作：把他从“正常人”中切割出去。但转译发生在切割的根基上——从道德转向了医学。他不是一个坏掉的灵魂，而是一个坏掉的大脑。这个转译，并没有拆除恶壁，而是给了恶壁一件新的白大褂。被诊断为“精神病态”的罪犯在今天承受的双重切割——法律的“有罪”与医学的“不可治愈”——比古代单纯被叫作“恶魔”的人，在制度的精密性和不可逆性上或许更为无解。因为医学话语的权威性使这道恶壁获得了“科学性”的外衣：它不是偏见，它是诊断。

量化风险评估：恶壁的数字化重构。 当代累犯风险评估量表采集一个人前科次数、首次被捕年龄、就业状况、物质滥用史等指标，输出一个风险评分。这个评分的设计初衷是技术性的：帮助法官做出更科学的保释、量刑与假释决定。但是，一旦“高风险”这个标签被贴上，它在社会心智中的运作方式，与古代的“恶逆之徒”或近代的“恶魔”没有本质区别。“高风险”不再仅仅被理解为“统计上更可能再次犯罪”，而是被转译为“这个人的内在质地更危险、更不可信”。恶壁被数字化了，但它的社会功能——切断重返的道——没有改变。更隐蔽的是，这个评分本身包含的变量——前科次数、就业状况——恰恰是被此前的监禁和恶壁所深刻塑造的。一个人因为被排斥而无法就业，然后“无业”这个变量增加了他的风险评分，更高的评分又通过假释拒绝和社区公告加剧了排斥。这不是风险预测，这是风险再生产。

在所有这些时代和制度下，同一个冷焰结构反复浮现：侵害行为激起社会恐惧，恐惧凝固为切割之壁，切割之壁压缩甚至封死生存空间，压缩后的生存空间催生新的侵害，新的侵害反过来为更厚的恶壁提供了“自证预言”的燃料。技术的形态在变——从十恶的株连到量表的评分——但堤岸双侧溃决、咬合加固的结构没有变。

七、直面反驳

一个判断如果不能承受它最有力的反驳，就不值得被提出。以下三组反驳威胁着本文的核心论旨，必须被正面回应。

第一组反驳：天生犯罪人论——CU特质的挑战。 发展心理学与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一部分儿童在两岁时即表现出冷酷无情特质——对他人痛苦缺乏反应、对惩罚不敏感、无法形成共情——而这些特质被证实有显著的遗传基础，并且是该儿童日后成为持续性暴力犯的强预测源。如果一个孩子在两岁时就已经没有那个能让容纳动作生效的情感接受器，那么本文的“容纳从未绽出→罪涌”路径，对于这个群体，还有多大的解释力？

这是一个本文必须诚实面对、不能回避的问题。回应分为两层。

第一，承认边界。对于带有强遗传基础的CU特质儿童，本文所描述的“容纳在关系中首次绽出”的路径，在分析的起点处就遭遇了一个结构性的困难：容纳关系的建立，不是一个单向动作——它需要婴儿与养育者共同构建一个可工作的情感界面。而CU特质儿童，由于其对他人情感反应的天生低敏感度，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养育者提供那个足以锚定容纳互动的原初信号——比如，在母亲微笑时回以微笑，在被安抚时逐渐平静。如果那个锚点不存在，养育者即便有充分的“遐想”能力，也失去了可以接住的东西——因为婴儿那一边，没有向外部发出可被接住的信号。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坦承：对于这类个案，罪涌在第一次暴发处，不能宣称完整的解释力。这并不是本文判断的失败——这是本文判断的诚实地基。

第二，即便如此，冷焰循环仍然咬合在这类人的反复犯罪轨迹上。CU特质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第一次暴发时不需要经历“容纳从未绽出→内部失措堆积→溃决”这一整条路径。但它无法解释——实证研究也不支持它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出狱后会再次犯罪。因为无论一个人的初始暴力倾向的生物基础有多强，他在首次被定罪之后所面对的那面恶壁——社会排斥、就业关闭、社区驱赶、存在否定——不会因为他的CU特质而变得更薄。恰恰相反：社会对于“天生犯罪人”这个标签的反应，往往是比对于普通罪犯的反应更严厉、更不可逆的切割。一个被公众和司法系统共同认定为“天生就有暴力倾向”的人，他的恶壁不是更薄，而是比特质的普通罪犯更厚——因为“天生”两个字，在恶壁的逻辑中，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同义词。罪涌也许不能完全解释他的第一次暴发；但罪涌与恶壁的冷焰循环，却可以在他一生中反复发作的轨迹上，找到它清晰的咬痕。本文不要来解释每一滴水的来源，它要解释的是那个让水一旦涌出就无法流回、只能反复泛滥的堤岸结构的双侧失效。

第二组反驳：真正邪恶存在论。“你的分析似乎暗示‘邪恶’只是一个社会标签、一种情感投影。但反过来想：想想那些在大屠杀、酷刑或系统性虐待中，不仅不被动服从、反而主动发明新虐杀手段并以此为乐的人。把这些人称为‘邪恶’，难道仅仅是‘社会恐惧的反向激荡’吗？你的论旨，是不是变相地卸去了这些人的道德责任？”

这是本文必须应答的最沉重的挑战，回应分为两层。

第一层：本文从未主张“邪恶”一词的使用是不正当的、或应当被废除。当一个社会面对系统性酷刑、种族灭绝、将幼儿殴打致死的施暴者时，它用“恶魔”这个词来完成终极的道德定性——这是社会在行使一种正当的道德认知，将极端侵害标记为“在正常人类道德经验边界之外的行为”。本文不反对这种标记动作本身。

本文追问的是：这个标记动作的机制是什么？它在完成标记之后，还持续地做了什么？当幸存者在战后讲述这些故事，当历史学家书写这些罪行，当后代在记忆这场灾难时，反复地、高强度地使用“恶魔”来为施害者定调——这个词汇的使用，是否同时也完成了一项功能：把施害者推入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存在论类别，从而让我们心安理得地不必追问：这些人的形成路径中，有哪些是某种制度、某种文化、某种长年累月的仇恨灌输所铺设的？追问这个问题，不等于否认那个人的邪恶程度。恰恰相反：恰恰是因为暴行的邪恶程度如此极端，我们才更需要追问它是如何被生成出来的。因为一旦“他是恶魔”被接受为终极解释，我们就已经放弃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恶魔”是一种可以被特定的制度、文化和关系失败系统性制造出来的东西，那么下一次，它会在哪里被制造出来？我们对此没有任何防御——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它的发生条件。

可以说，恰恰是因为行为极端邪恶，我们才更不能接受一个“他天生如此”的终局解释。因为那个解释所做的，不只是对施害者进行道德定调——它在同一个瞬间，也宣告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恶魔”是不可理解的、不可研究的、不可预防的，那么我们每一次说出“恶魔”这个词，就是在放弃一次理解恶的发生条件、从而在将来阻止它的可能。追问恶的发生条件，不是卸去施害者的责任；追问恶的发生条件，是确立我们——作为社会成员——在恶面前的能动性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拒绝追问，我们才是真正的卸责者：不是卸去施暴者个人的责任，而是卸去我们作为社会成员去追问“恶的发生条件”的那一份集体责任。

第三组反驳：冷焰循环中“恶壁内化”的发生机制是否被跳过了？在案例叙事中，王某说“他们说对，我就是个定时炸弹”。这句话被本文称为“恶壁在施害者内部被内化之后的精确回响”。但“内化”这个词本身，是最容易被滑过去的一个词：作为外部排斥的恶壁，是如何变成施害者主体内部的一个自我理解的？这个过程是什么？

本文在此处补上这个生成机制步骤。恶壁内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认同”——不是王某听到了别人叫他的名字，然后点头说“对，这就是我”。在王某的案例中，这一内化经历了三个可以辨识的微观阶段。第一阶段：反复碰撞。他每一次尝试与正常社会制度进行接触——提交求职申请、与工头约好上班时间、在出租屋门口和邻居打招呼——得到的回应都是一堵沉默的、不需要解释的墙。这些墙的学名可以叫“就业歧视”“住房歧视”“社交排斥”，但在他那一侧，它们的统一形态是：你在还没开口之前，就已经被拒绝了。第二阶段：自我防御的耗尽。最开始他还会有愤怒——“凭什么？”但他没有表达对象，因为那堵墙没有脸。后来他不再愤怒，因为每一次愤怒换来的都不是回应，而是更深的沉默。再后来，他发现如果他把那个来自外部的名字——“定时炸弹”——自己先说出口，它在胸腔里的胀痛就会减轻一点点。这不是认同，这是自嘲式麻醉。第三阶段：叙事接管。当他在供述中说“那我就炸吧”的时候，恶壁完成了它在主体内部的终极殖民。他说出的这句话，在字面上是一个决定，但在生成机制上，是恶壁借他的嘴说出了它一直以来在对他做的事：你已经没有别的路了。这个“决定”之所以不是自由意志的行使，而是恶壁内化的终局，是因为在他面前，所有不是“炸”的路都已经被恶壁堵死。他“选择”了炸，不是因为炸是最好的选项，而是因为炸是唯一没有被恶壁锁住的那扇门。

八、结论：冷焰循环——一个此前未被命名的咬合结构

这篇论文追问了那个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邪恶才犯罪，还是犯罪才邪恶”——但它给出的回答，不是在这两个选项中挑一个，而是追问了这道选择题本身所依赖的那块地基。

罪涌与恶壁，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事后互贴标签。它们是同一座堤岸在同一个事件中双侧溃决的共生后果。那座堤岸，叫作容纳——一个人和一个社群之间那道共享的、使得侵害行为可以被理解、侵害者可以被承认为人的界面。在个体一侧：容纳界面从未在关系中成功绽出，原初失措在长年累月的无处可去中被逼成向外溃决的侵害——罪涌。在社群一侧：侵害行为撕裂了社群对“人类行为是可理解的”这一认知基底，恐惧在瞬间凝固为将侵害者从人类范畴中整体切割出去的排斥之壁——恶壁。

这两个事件不是在时间中先后发生的两个独立步骤。它们在同一个事件中一并发生，并在事后的每一次遭遇中互相提供燃料。罪涌的过量伤害——那里面携带着施害者体内从未被任何人接住过的全部失措——让社群恐惧得更深，因而把恶壁砌得更厚；恶壁越厚，施害者越被从每一个合法生存的折返口中推出去，直到那个唯一还为他留着一条缝的场域——暴力——变成他唯一还走得通的路。然后，当他再次犯罪，整个社会看到他“果然又犯罪了”，而这又反过来为加厚恶壁提供了不可辩驳的“自证预言”。

这个冷焰循环，是本文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逼出的、此前未被命名的辨别维度。比昂的容纳理论追溯了个体内部的溃决机制；标签理论与累积性劣势理论追溯了社会排斥的效应链条。但没有一个既有框架，将这两端放回同一个时间点，当作同一个堤岸结构在双侧的同时坍塌来考察——并论证这两种坍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两副面孔，互为燃料。本文的冷焰循环论与累积性劣势理论的核心差异在于：累积性劣势解释了梯子怎么没了；冷焰循环论证了梯子还在的时候，钩子已经熔断了——而熔断钩子的那股高温，正是罪涌所激起的认知基底断裂。

这个发现，对我们通常思考“犯罪”与“邪恶”的方式有三个直接推论。

首先，它要求我们正视：每当我们说出“这个人就是邪恶的”并就此止步，我们诚然完成了一次道德情绪的宣泄，但在同一个瞬间，我们也关闭了一扇追问的门。恰恰是因为某些暴行的邪恶程度如此极端，我们才更不能接受一个“他天生如此”的终局解释。因为那个解释在定调施害者的同时，也宣告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追问恶的发生条件，不是卸去施害者的责任——追问恶的发生条件，是确立我们在

恶面前的集体能动性的唯一方式。

其次，它要求我们审视那些已经砌进了制度里的恶壁。当一个社会在量刑指南里写入带有“永久威胁”预设的条款，在社区公告栏上公开一个已服完刑期的人的全部个人信息，在雇主背景系统里把“曾有犯罪记录”设为永不消除的红字——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客观地管理风险”，但我们同时也在为罪涌的又一次溃决铺设蓄水层。制度需要一种自觉：它所做的每一次不可逆的标记，都不只是一个对先在风险的无辜反映，而是参与构建了它声称只是在被动应对的那种恶。恶壁不是罪涌的后果——它是罪涌的同谋。一个承认这一点的制度，不是要放弃对公共安全的保护，而是要在每一次砌墙动作发生之前，先问一句：这道墙砌下去之后，是在关注威胁，还是在制造那个它声称要关注的东西？

最后，这个发现逼我们直视一个比“我们应当更有同情心”更难接受的认知：那个做出了我们无法理解、不应原谅、且必须被依法惩罚的侵害行为的人，他的行为不是从一个与我们完全异质的、外于人类的源泉中冒出来的。它仍然是一种人类的可能性——一种在容纳从未发生、堤岸双侧同时塌陷的特定条件下，被逼至极端的人类可能性。承认这种连续性，不是否认侵害的邪恶程度，也不是减轻施害者的责任。它是在说：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种连续性，我们就是在拒绝理解恶的发生条件；而拒绝理解恶的发生条件，就是放弃了在将来阻止它的可能。阻止下一次罪涌的起点，不是更厚、更快、更不可逆的恶壁，而是承认那条缝隙从来不是施害者一个人身上的洞——它是我们与他之间那堵堤岸内侧和外侧，在被同一个事件打穿之后，从此再也没被处理过的地方。它不是需要被“修好”——它从来就没有完好过。它需要的是被承认为一个不断生成、不断瓦解、不断需要被重新处理的共享事件，并为此发明出能够持续处理这个事件的制度。

证伪条件与边界

本文关于“罪涌”与“恶壁”冷焰循环的判断，在以下边界内适用，也在以下条件下可被证伪。

边界：本文所描述的罪涌发生路径，适用于那些侵害行为的深层驱动源可以被追溯至“容纳界面从未在关系中成功绽出”这条路径的施害者。本文坦承，对于某些带有强遗传基础的CU特质个体，其第一次暴发的驱动源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不经过本文所描述的那条生成机制路径——在他们身上，容纳界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可工作的情感锚点，而非在互动中被系统性地拒绝绽出。然而，即便在这个群体中，“冷焰循环”所描述的恶壁-再犯咬合机制仍然适用——且恶壁在他们身上往往比特质一般罪犯更厚。

证伪条件一：如果将来有确凿的跨文化、大样本纵向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在童年期经历了系统性的、已被独立测量确认的容纳从未绽出（而非容纳的晚期丧失）的个体，其成年后暴力犯罪的发生率与控制组（未经历容纳失败或经历了其他类型的童年逆境）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则本文关于罪涌发生路径的判断将被证伪。

证伪条件二：如果将来有准实验研究（如利用司法政策变迁作为外生冲击）表明，在被定罪者所承受的社会排斥程度（以就业率、居住稳定性、社会网络重建等可观测指标度量）被显著降低的条件下，他们的再犯率未出现相应的显著下降——即“恶壁”的厚薄与“再犯”的概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则本文关于冷焰循环第二重咬合的判断将被证伪。冷焰循环的关键裁决预测是：在控制了初始罪行严重程度与个体犯罪倾向之后，社会排斥的深度（不只是排斥的有无），独立预测再犯风险。冷焰循环相对于累积性劣势理论的附加预测是：在控制了机会关闭程度之后，排斥是否以“不言自明、无需辩护”的形态出现，将独立预测被排斥者是否转向暴力性再犯而非其他非暴力再犯形式。如果这一附加预测被驳倒，则冷焰循环的“钩子熔断”论需要被收缩为仅适用于某类特定侵害者，而非本文所主张的共生结构。

证伪条件三：如果有一类极端暴力侵害者，其行为与任何可识别的关系史变量之间，经过多轮独立测量与跨方法验证，均不存在任何统计学上可被追踪的关联——即其侵害行为完全是自发于内部、独立于一切可测量的人际关系史与社会处境的“纯粹内在毁灭冲动”——则本文关于罪涌发生路径的判断在该类人身上不成立。本文不否认此类“从虚无中生成”的毁灭冲动的逻辑可能性；本文只指出：在当前的实证文献中，我们还没有看见过一个这样的确凿个案——不是因为不存在，而是因为一旦这种个案被提出，它总是还没有被放在足够精密的、控制住恶壁自证预言效应的研究设计下加以检验。冷焰循环的判断，正是在这块被既有研究习惯性跳过的空地上，等待被检验或驳倒。

注释

[1] 本案例基于真实事件，已对姓名、地点及若干细节作匿名化与类型化处理，仅用作理论思想拓展的例示，并非严格实证个案报告。

[2] 本文对“恶壁”与“污名”的区分，以戈夫曼《污名》所做的工作为对话对象：污名系对社会身份的贬损（“受损的身份”），仍将对方保留在“人”的范畴内；而恶壁则是对“人”之存在论范畴的整体切割，二者的理论地层不同。实证判别标准：当排斥不再需要向排斥者自己证明其合理性（它变得不言自明、无需辩护）时，就从污名滑向了恶壁。

[3] 本文“冷焰循环”一词借自化学中的冷焰（无焰燃烧）概念，用以喻指罪涌与恶壁之间不引人注目却持续消耗一切折返余地的共生过程。

[4] 本文虽借用了精神分析传统中“容纳”等术语，但已将分析单位从比昂的个体心智装置（二元关系），迁移至个体与社群之间那道共享的堤岸结构。因此，本文的“罪涌”在存在论上不可还原为比昂的“容纳失败”——这不仅是对比昂框架的补充，而是对其二元关系存在论的置换。

参考文献

- Augustine. Confessions. c. 397–400.
- Beccaria, C. 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1764. English edition: An Essay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 Becker, H. S.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 Bion, W. R.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Tavistock, 1962.
- Feinberg, J.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Punishment.” In Doing and Deserving: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95–11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本文发表于1970年，原为1965年提交的论文手稿。)
- Foucault, M.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 âge classique. Paris: Plon, 1961.
- Goffman, E.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3.
- Lemert, E. M. Social Pathology: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opathic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51.
- Sampson, R. J., and J. H. Laub.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容纳理论、投射性认同的硬边界

比昂的容纳与克莱因的分裂及投射性认同是本文最近的两个对手，正文提及比昂但未完成硬切。分野在缺失之物的性质：容纳理论描述一个曾经运作过的容纳功能失败或不足，其临床图景是被退回的、未被消化的经验；本文主张容纳从未在关系中绽出过——不是一个功能坏了，而是它从未上线，因此没有可退回之处。分裂与投射性认同描述主体把不可承受的部分置于他者之内，其前提是主体内部已有可被分裂的结构；本文的社群侧机制不是投射，而是范畴开除——把人从“人”这一类别中划出，这是一个认知分类动作而非动力学防御。可判别面：若所有本文所述个案在深度临床工作中都显现出可被激活的既存容纳功能，则本文过强，容纳理论已足够。

增补二：冷焰循环的可编码形式

共生结构若不能编码，跨时代跨制度的反复出现就只是印象。三项指标：容纳绽出史——一个体在成长期中是否存在任何一次痛苦被他人接住且未被评价的记录；范畴开除强度——社群对该受害者的公共表述中，非人化词汇（怪物、畜生、非人）占全部否定性表述的比例；回环闭合度——该开除是否反过来降低了同类个体获得容纳的机会，可由同类人群的社会接纳指标测量。第三项是本文的关键主张所在：没有它，冷焰循环只是两个并列现象。

增补三：与同批《善的慢发生》的分野

作者同批已发表《善的慢发生与它的结构性驱逐》，两篇最近且方向互补，须划清。那篇的解释项是善的发生条件被效率逻辑清除，恶只是空地上唯一能自然长出的东西——它不追问具体侵害如何被逼出；本文的解释项是容纳从未绽出所积累的压力如何在临界点向外溃决，以及社群一侧的同步凝固。前者是条件性缺失，后者是压力性溃决。两者可以在同一个案上同时成立，但它们的证伪面不同：前篇看条件恢复能否改变行为，本文看容纳绽出史能否预测溃决。混读会使两篇互相削弱。

增补四：限界与不得外推之处

本文不主张所有严重侵害都出自容纳未绽出，不主张非人化表述必然导致再犯，也不能用于任何个案层面的预测或风险筛查。它的主张只在机制层面：存在一类侵害事件，其发生与社群的事后凝固构成同一结构的两侧。凡把这个机制命题转为个体评分的做法，恰好落进作者另一篇《数字是骨头》所批评的那套逻辑，并使本文自我背叛。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Wilfred R. Bion,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Heinemann, 1962.

Melanie Klein,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7, 1946.

Donald W. Winnicott,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Hogarth Press, 1965.

Nils Christie, “Conflicts as Proper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7(1), 1977.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